

耐心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基于《资本论》中资本时间性的研究

金英姬

摘要:资本的时间性本质是资本家为获取利润往往牺牲长远利益以实现资本连续、快速增殖,这体现了资本的短视性特质。耐心资本通过“耐心”的特质克服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弊端,从而实现在生产、流通、金融资本三大向度上消解传统资本短期套利、快进快出的逐利化内在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耐心资本的投资模式展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智慧,也为自身壮大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关键词:耐心资本;《资本论》;金融资本;资本短视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26)03-0026-13

DOI:10.15993/j.cnki.cn35-1198/c.20260708.012

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长期投资、长期回报的投资模式,是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资本短视性、逐利性和投机性特质的一种重要资本形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1](P11)]。202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2]202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政策性金融支持,壮大耐心资本。

对耐心资本的关注可追溯至20世纪早期欧美学界对于国家发展的长期导向理念的研究。学者提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具有长期导向的倾向,对资本低收益的接受程度高。^[3]关于耐心资本的早期研究多从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间的关联入手,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经济发展^[4]、创造就业机会^[5]。从国内研究出发,林毅夫和王燕最早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对耐心资本做了剖析,即耐心资本自身具有的长期性、风险容忍性和稳定性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近年来,国内学者从耐心资本的发展路径^[7]、积极作用^[8]与赋能新质生产力^[9]等角度出发做出了有益的探讨。陈绍辉和孙熙国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辩证作用出发探讨了耐心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0],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立场理解耐心资本对传统资本局限

收稿日期:2025-10-16

作者简介:金英姬,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亚太经济。

性的突破,从而深化对耐心资本的培育条件、现实影响和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的理解,需要回到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时间性和短视性的讨论。本文从马克思《资本论》视域下资本“时间”这一核心概念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资本的运动逻辑,为“耐心资本”的分析提供扎实的理论工具和现实指导。

一、资本时间性的基本逻辑

资本运动不能绕开时间的概念。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运动是由社会物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因而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1](P922)},具有社会历史性。资本的本体始终在时间中运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二重性的视角入手阐述了这一观点。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物质本身和社会存在形式,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而“因为劳动是运动,所以时间是它的自然尺度”^{[12](P157)},劳动的时间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底层逻辑和依据。基于劳动的时间可计量性,劳动力“出售”他们的劳动时间,并使自身日渐成为商品,即“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3](P198)}。资本的增殖是通过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使用完成的,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相统一,价值增殖的过程依赖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正常消耗。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的价值评判取决于凝结于其中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这种交换比例最终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等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

在资本的生产领域,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存在着辩证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工作日被切割为两个对抗性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的等价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无偿创造剩余价值的被掠夺时间)。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依赖对时间绝对长度的拉伸,构成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间的第一重逻辑。但绝对时间的剥削有其限度,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家开始通过技术革命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相对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其在同等工作日内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体现出资本对相对时间的剥削,“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14](P373)}。

在资本的流通领域,资本运动本质是为了更快地实现剩余价值的积累。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其价值增殖的生命力全然系于循环流程的连续性。从这种连续性出发,单个资本在运动和循环的过程中因其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形式而形成三种资本循环的形式,分别是货币资本循环 $G \cdots G'$ 、生产资本循环 $P \cdots P$ 和商品资本循环 $W' \cdots W'$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 $G \rightarrow W$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 $W' \rightarrow G'$ 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15](P63)}资本流通领域的时间性矛盾要求资本必须持续

完成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再到商品资本的形态转化,任何阶段的停滞都将导致资本职能的丧失,资本的增殖能力完全依赖运动的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不同资本形态间的转化速度决定资本增殖的效率。资本经历一次循环的时间总和为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之和,包含了资本价值循环周期间的时间差和资本价值增殖以及生产过程更新的时间。对于生产时间而言,其包含了储备时间、自然力作用时间、生产过程中断时间和劳动时间,其中劳动时间是产生剩余价值的关键,因而“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15](P141)}。对于流通时间而言,货币资本循环突出了流通的特性,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包含了 $G-W$ 和 $W-G'$ 的部分,后者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往往更困难,只有商品形态的资本价值被转化为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后,才能转化为其他的生产资料再次投入生产、工人的定期酬金和资本家的其他私人消费。资本流通的本质是“买”和“卖”,资本的增殖要求货币形式 G 的尽快复归。

资本周转的中心问题是资本的运动速度,资本增殖与各个环节的时间密切相关。资本在一定时间内周转的次数越多,价值增殖速度越快,这就意味着资本一次循环的时间要被尽可能缩短。资本周转的速度差异,还取决于生产资本的构成比例。对于预付资本来说,固定资本构成其主要部分,在劳动资料中,“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15](P177)}。因而预付资本周转的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15](P206)},这就意味着,资本被以一种固定的形式束缚在固定资本内直到其寿命终止。固定资本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被固定在其中的时间就越长,一定时间内进入流通的价值也就越少。因而,考察资本周转的速度主要是考察预付资本价值的周转,“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15](P173)},而当固定资本在预付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大时,资本周转就慢;反之,资本周转就快。

因而,在预付资本的周转中,只有流动资本中的可变资本才能创造价值。因为只有“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涌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15](P326)}。在时间的维度上,预付资本只有在其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能执行职能,资本周转的速度越快,在固定时间内周转次数越高,其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就越高;以年作为单位,该资本的年剩余价值率也越高,从而可以更快地增值。因而,从单个资本再生产的角度出发,这一周转速率直接影响年剩余价值率,进而影响着资本持有者的投资偏好。然而,在大多数科技、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领域,商品资本货币化的过程较长,往往被传统资本所抛弃,而耐心资本对传统资本快速逐利特性的超越,能促进对相关产业的资本投入,从而更稳健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导向,也是其基础:“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15](P132)}信用经济起源于对贵金属弥补商品市场中流通货币量的替代手段,生产金银得出的产品并不能作为消费品供社会利用,每年耗费在金银生产商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15](P382)}。信用制度的出现,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贵金属作为流通货币量补足的问题。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是信用制度的两种主要形式。商业信用发生于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职能资本家之间。银行信用的范围更广,可以把货币资本贷给任何企业,它来源于那些尚未执行资本职能的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资本只要停留在货币形态上,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而不增殖价值;这个资本就闲置起来”^{[15](P382)}。除了闲置货币,个人储蓄和食利者资本也共同组成银行的借贷资本。

经济扩张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互相促进,意味着对于剩余价值的分割时间延伸到了未来。信用对现实货币的替代实质上是一种延期支付,是一种对未来可兑换成现实货币的信用。“有价证券不仅是对固定资本价值的所有权证书,从而也是对这种价值的未来再生产的所有权证书,而且同时是对未来的价值增值的所有权证书。”^{[16](P336)}这里的证券,包括股票、债券等一切证明资本所有权证书的纸制副本,构成虚拟资本的产生基础。这些证明可以在证券市场中自由买卖,并通过反复进出证券市场以利用短时间内价格差额的变化带来收益。金融资本极大降低了支付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促使资本不断缩短流通的时间,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一加速流通的手段的出现,加剧了资本的短视性。

资本的时间性本质是实现资本连续、快速的增殖。正因资本对于循环和周转速度的不断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讽刺道,“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15](P67-68)}。资本家通过将商品和货币资本化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掌握了增殖的主导权,使资本不断追求短期内能够实现快速回报的投资方式:“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14](P871)}资本家为获取利润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牺牲长远利益以实现增殖,这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短视性的批判。

二、资本的时间扩张与资本的短视性

资本短视性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增殖逻辑,“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14](P178)}。无论是资本循环还是资本周转,都要求资本家尽可能快地完成所有的生产、消费、再生产流程,通过货币高速流通以缩短回报周期,实现剩余价值的榨取与价值增值。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和规模的迅速扩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以信用制度为核心的金融资本时代,资本的增殖逻辑真正意义上成为社会范围内的主流逻辑。

在资本不同阶段的时间扩张背景下,资本的快节奏和金融资本的垄断性从多方面加速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其一,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使资本被眼前剩余价值支配,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资本的本质出发,资本以复利为目的,通过实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15](P89)}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来不断扩大再生产,从而通过再生产促使剩余价值不断增加。随着资本循环的连续发生,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特性促使货币资本快速转化为生产资本,刺激了再生产的繁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真的需要这么多的生产,资本逐利的特性往往导致市场供需失衡,因为对暂时性剩余价值的追求造成生产过剩。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来看,资本往往重视对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投入,而刻意压制可变资本的投入即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格的降低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这背离了马克思强调的“两大部类平衡”:生产资料部类的扩张需以消费资料部类的同步增长为前提,但资本家忽视了劳动力作为消费主体的属性,为后续消费萎缩埋下隐患。资本短视性的核心矛盾,是将社会消费窄化为资本回流的工具,而非再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使得社会消费水平并不同步于真实的供需情况,最后导致供大于求的资本主义危机。

其二,资本主义市场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向一种无休止的扩张体制,抑制对长期价值的创造。由于不同产业成品产出速度间存在差距,“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15](P255)}。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使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情况下引起既定资本预付时间上的差别:劳动期间短的部门,预付资本可通过快速产出成品、实现资本的迅速回流;劳动期间长的部门则需将大量资本长期放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上,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资本周转。同时,在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生产过程紊乱的情形下,市场需求骤降、货币资本回流受阻,对于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链接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15](P257)}来说,前期投入的生产资料将因生产停滞而闲置,已投入的劳动力也会因工序中断而被迫失业,劳动和生产行为都会中断,预付资本的全部价值都可能陷入无法转化为商品价值的困境,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成本会被浪费。这些风险在企业选择生产部门和行业时均会纳入其考量,在传统资本单纯逐利的情况下,短周期偏好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的失衡:长期价值创造领域因资本投入不足而发展滞后,短周期部门则因过度扩张陷入产能过剩,最终形成扩张、过剩、危机、抑制长期创新的恶性循环,印证了马克思对自由竞争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批判。

其三,金融资本的时间扩张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债务危机。金融资本的相关思想最早可见于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论述,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最早对金融资本进行了系统阐述,而《资本论》中对于资本时间性的论述是金融资本的理论基础。这包括:劳动价值论中货币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论中资本的运动规律、资本循环与周转运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息资本、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本质以及生产过剩带来金融危机五大理论体系。这些有关金融资本理论的内容都围绕着

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而资本的运动规律及其时间性则是支配金融体系运作的核心。一方面,信用的实质是一种延期支付,是对未来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预支。当每一个期限到达时,如果期限前的生产过程中凝结的价值无法支付借贷的价值,虚拟的资本就会转化为负债。以工人工资的支付为例,在一个资本周转不那么快的产业中,工人被支付工资的频率,高于工人本身在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在市场上被转化为货币的频率,“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15](P347)}。这意味着,当支付能力提升、购买需求增加的同时,这种工人的需求却没有相应社会生产的供给,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需求先行、供给滞后”的紊乱现象。这种由周转差异引发的矛盾,在信用制度加持下更易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维持工资支付的行为,本质是将短期支付压力转化为长期债务,一旦产品货币化失败,便会触发债务链断裂,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信用制度本身加速了负债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到来。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再生产对于生产要素即机器、劳动力、原料等的需求快速增加,商品交易的规模和速度也不断提高,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11](P544)},商业信用不断快速发展。通过信用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克服了周转的不同周期,其提供的货币资本补偿了因周转周期导致的生产中断问题,“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11](P545)}。信用制度使产业资本得到充分运用,生产过程不再中断,“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1](P546)},最终引发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过剩,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资本的时间性既是资本能够实现快速增殖的内在动力,也是资本主义体系最终崩溃的深层动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长远视角看,对于资本短视性的突破,本质上还是要突破资本异化逻辑,创造更高形态的社会经济体制。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主动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变革是解决资本异化的根本方式。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分工的生产机制,在这一历史使命完成后,就应该作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被扬弃。而在市场经济的当代语境之下,新的资本形态同样有助于突破传统资本的困境,有效缓解资本市场的现实张力。《资本论》揭示的上述政治经济学原理同样为这一路径下的实践打开了理论空间。

三、耐心资本对资本短视性的突破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常常倾向于选择短时期、高回报的项目,而忽视长时段、稳健型回报的投资领域,“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15](P68)},生产丧失了本原。耐心资本作为专注于长期投资的一种先进资本形式,较好地突破了资本的短视性难题。耐心资本是一种专注于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的,具有较高风险承受能力的资本形式。从资本的一般属性来看,耐心资本并未脱离资本的增殖逻辑,本质上仍属于资本范畴,能够促进生产资料的集中和规模化生产,创造剩余价

值,追求长期稳定的回报仍是其存续的基础。它的创新之处在于调整了传统资本的时间偏好与风险偏好,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资本快进快出、只挣快钱弊端。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由于社会分工而得到独立的发展,逐渐从产业资本的运动中分离出来,由不从事生产活动的特殊营业部门承担,从而产生了同产业资本并列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二者仍然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立足于流通领域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它的出现可以节省流通领域的货币准备金,以缩短产业资本循环的流通过程。从资本流通出发,在商业资本的基础上,希法亭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信用的概念,即一种将闲置货币转化为流通起来的货币资本的信用形式,由银行掌握这一货币来提供相应的信用^{[17](P80)},构成银行资本。在货币资本中的固定信用资本贷出后,银行和企业将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利益共同体,“产业利润合并了商业利润,又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即达到作为金融资本的最高资本形式的三位一体的赃物”^{[17](P247)},资本主义社会日渐走向金融资本时代下的集中和垄断。本文立足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形态,从生产、流通、金融资本三个向度出发,考察耐心资本在具体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实践中如何突破了资本的短视性弊端。

其一,在生产向度上,耐心资本的稳定性允许生产过程的延续性与资本更长期的积累。一方面,耐心资本的稳定性符合长期性产业劳动资料的作用规律。“真正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是在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次数多少不等的反复中不断地重新发挥作用的,因而,它的价值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15](P63)}对于一些劳动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其不变资本的周转周期长,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固定在生产资料中。固定资本比重的提升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耐心资本能突破对剩余价值的即时榨取,自愿地将资本投入到大型技术设备,通过稳健投资提升固定资本的比重,稳定地促进资本发展。另一方面,耐心资本能够为产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是因为耐心资本超越了单纯追求资本短期增殖,而从对未来回报的长期预期以及对社会贡献的关注出发,使资本的运作方式具备了更长远的视角。耐心资本还可以支撑长期性产业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在任何产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中都会存在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这一阶段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但这一生产中断“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15](P140)}。生产过程的中断,即劳动时间的间歇是任何产品形成的必然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的突破性发展依赖于生产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投入。传统资本的短视性会强行割裂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导致需要长周期打磨的生产环节难以实现。企业往往在生产尚未完成价值增值的关键阶段,如技术攻坚、工艺优化时就抽离资金,转向更快见效的领域。而耐心资本的“稳定性”,通过长期主义与风险容忍的资本投入,为生产过程的完整推进提供保障,同时构建资本长期积累的良性循环,从生产源头突破短视资本的桎梏。

其二,在流通向度上,耐心资本通过延长资本在生产环节中的停留时间来实现增值。从流通环节上看,资本需依次完成G—W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商品与W'—

G'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形态变换,其中G—W阶段是资本进入生产领域的前提,资本“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15](P143)},这一阶段的顺畅与否,直接决定后续生产能否启动。尽管商品资本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但一些不变资本的储备依然存在“相对的减少的情况”^{[15](P159)},并非所有作为生产资料的商品都能立马被购买,对其的获取需要耗费时间;或因为市场中供给关系的变化导致价格变动而超出资本家对其原有的估计,从而导致可得性的下降。^①耐心资本的核心突破,正在于通过合理延长资本在G—W阶段的停留时间,让流通回归服务生产的本质,通过流通环节的充分准备,为生产提供稳定、优质的要素支撑,使资本增值不再依赖周转速度,而是依赖生产与流通的协同稳定性。

从资本周转来看,耐心资本跳出了周转越快、增殖越多的传统资本困境。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必须以不损害生产过程的质量与流通环节的稳定性为前提,否则便是无效的周转。传统资本的典型操作是压缩生产时间中的必要非劳动时间(如原材料储备时间、技术研发时间)与流通时间中的必要储备时间,以求快速完成从预付资本到货币的循环。这一操作方式往往造成很多问题:为提升产业的周转速度,部分资本会采取压缩生产资料储备时间、研发时间等方式,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由于准备不足,可能出现生产中断或商品质量不达标而滞销等问题,导致实际周转时间的延长。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18],可见耐心资本不追求绝对周转速度,而通过保障有效周转保留必要的周转时间,确保每一次周转都能实现高质量价值增值。

其三,在金融资本向度上,耐心资本起到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金融资本的本质是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体,核心功能在于为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提供资金支持。而随着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信用经济时代发展,金融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种由银行支配的货币资本。传统短期金融资本趋向于将短期套利奉为核心目标,一方面通过投机行为如虚拟经济炒作来实现资本快速增殖,另一方面通过对实体经济领域中短周期、高回报的项目过度放贷保证高额回报率。这导致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领域如硬科技、基础研究等具有长周期、高风险、慢回报特性的产业缺少金融资本的支持。从耐心资本的来源出发,主要包括政府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资本,这些资本往往具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不追求快速的高额回报和变现,天然构成支持慢回报产业的资金库,其核心价值在于引导金融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来抑制资本原生的投机性,匹配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周期,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论》中明确将生产力解构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核心要素。对于新质生产力来说,“新”体现在新型劳动者、新的劳动资料和新的劳动对象等多个维度。其一,其对劳动者的核心要求是具备数字素养、科研能力、跨界协同能力的创新型主体,而这一素质转型需要长期投入,恰好是短期资本不愿覆盖的领域。同时,短期资本倾向于“使用现有劳动者”,而耐心资本主动承担“培育新质劳动者”的

成本。其二,传统劳动资料的研发周期短、回报快,短期资本愿意介入;但智能化劳动资料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的研发时间长、失败率高。耐心资本通过介入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资源间互联互通,使劳动资料的效能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通过网络效应辐射整个产业链,发展了马克思“劳动资料社会化”的理论。其三,新质生产力对物质劳动对象的核心要求是“高性能、低消耗、可持续”,耐心资本可以最大程度上容忍前期的技术试错,培育数字劳动对象,实现劳动对象的拓展与升级,推动生产力向高效化、绿色化转型。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角看,耐心资本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本质是资本属性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适配。

综上,耐心资本对资本短视性的突破,并非否定资本促进生产集中、实现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而是通过“耐心”的特质克服资本运行过程中的弊端,从而实现在生产、流通、金融资本三大向度上消解传统资本短期套利、快进快出的逐利化内在矛盾。耐心资本的这种突破效能,并非仅靠资本自身属性即可充分释放,“耐心”特质的培育、长期导向的落地,需要适配的制度环境与实践路径作为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P4)},展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中国智慧,为耐心资本的生长和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耐心资本的潜在风险与发展进路

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为耐心资本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的短视性使单个资本间周转速率存在差异,单个资本只关注自身周转效率,完全无视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协调,周转快的部门因逐利过度扩张产能,周转慢的部门因资本投入不足产能萎缩,引发社会资本运动节奏的紊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常常催生虚假需求,最终引发虚假繁荣的崩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周期长于工人获得报酬的周期,由工人消费引发的投入市场中的货币总量不断增多,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减少,消费需求得到刺激,但生产资本仍处于生产领域而未转化为商品,使得市场表面繁荣一段时间后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15](P350)}。

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资本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较弱,因而需要预先计算和储备好一定的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满足长时间内不向市场提供生产资本要素的产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需求。在中国,耐心资本的出现是这一宏观调控发生作用的现实表征。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短视性受私人占有制束缚的不可克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根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这一制度属性与价值导向,天然契合耐心资本长期导向、价值优先、兼顾效益与公平的核心特征。这种改良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内生需求,是针对传统投机性资本导致市场波动加剧、公共领域投资不足、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时,资本对自

身增殖逻辑的一种“约束”,以实现可持续增殖。从这个意义上说,耐心资本是资本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自我优化,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可利用的资本形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其中“有为政府”的“有为”,并非简单的干预市场,而是以社会主义本质为遵循,弥补市场失灵、引导资本流向、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耐心资本正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具有自发性逐利倾向,若完全由市场主导,资本会天然流向短期回报率高的领域,导致基础科研、公共服务等具有长期社会效益的领域投资不足,“有为”首先要体现在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投入,将耐心资本的目标锚定在人民共同利益上,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政策,降低耐心资本在公共领域的投资风险,引导市场资本参与;其次,要以国有资本直接出资设立耐心资本基金,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国家战略领域,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引领作用;最后,建立“社会价值优先”的投资评估体系,将就业吸纳、生态保护、公共服务供给等指标纳入投资考核,而非单纯以利润率为标准。这种目标导向的“有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引导,是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

(一)潜在风险

然而,“有为政府”下国有资本主导的耐心资本也可能诱发一系列风险。其一,国有耐心资本往往面临“政策目标”与“盈利目标”的双重约束:一方面要服务于产业链自主可控、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任务,可能需要投入低回报甚至非盈利领域;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又需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这使国有企业既无法像纯粹公益资本那样聚焦长期社会效益,也难以像民营资本那样实现市场化效率优化。同时,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中间环节多,管理者缺乏市场化激励,可能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项目推进迟缓等问题。

其二,国有资本的管理体系往往与行政层级深度绑定,耐心资本的投资决策易受行政干预:一方面,投资项目可能沦为地方政府“政绩工程”,而非基于市场需求与产业规律;另一方面,决策流程过度强调合规性而非实效性,层层审批、集体决策导致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滞后。我国国有资本的考核体系仍未完全摆脱短期化束缚:一方面,国资监管部门对国企的考核以年度营收、利润、资产负债率为核心指标;另一方面,国企管理者的任期制与晋升机制与短期业绩直接挂钩,若投入长期项目导致短期业绩下滑,可能影响晋升。这种考核导向迫使管理者急功近利。同时,国有耐心资本掌握大量低成本资金、土地、政策资源,且投资领域多涉及特许经营、战略资源开发等领域,资源集中化和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极易滋生寻租行为。例如,可能存在“关系户”优先获得投资;通过关联交易、虚假立项等方式转移资金;因缺乏独立第三方评估难以发现违规操作等情况,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其三,耐心资本的投资对象多为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的领域,需要基于专业判断

的“容错空间”。但国有资本管理者的任期制与政绩考核导向,使其要么倾向于选择短期可见成效的项目,回避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发;要么盲目跟风,缺乏对技术可行性、市场需求的深度论证。然而,耐心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容忍试错”,尤其是在科技研发、新兴产业领域。但我国国有资本对风险的容忍度普遍偏低:一是问责机制严格,若项目失败,管理者往往面临“终身追责”,而忽视决策过程的合规性与专业性;二是缺乏明确的“容错清单”,缺乏具体标准,导致管理者不敢将资金投向一些真正需要的领域。

其四,若国有耐心资本过度介入竞争性领域,可能凭借资金成本、政策优势形成隐性垄断,挤压民营耐心资本的生存空间。例如,在高端制造领域,国有资本可获得低息贷款、税收优惠,而民营耐心资本融资成本高、风险承担能力弱,难以与之竞争;同时,部分国有资本采用非市场化决策模式,容易造成资源低效配置,挤占民营资本布局新兴产业的投资机遇,最终削弱整体市场的创新动能。

其五,耐心资本的退出机制仍有待完善。一是退出方式单一,耐心资本多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实现退出,即将私人权益转化为公共股权以实现资本增值。然而耐心资本投资的重资产、高风险项目往往难以满足IPO的盈利要求;二是资产流动性差,国有耐心资本投资的项目多为非标准化资产如厂房、研发设施,缺乏成熟的二级市场交易平台,难以快速变现;三是保值增值压力,国有资本退出时需严格遵守“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原则,若项目估值低于投入成本,可能面临问责。

(二)发展进路

破解耐心资本的风险与困境,需立足中国实际,构建长期导向、市场驱动、风险共担、多元参与的发展生态,实现耐心资本的战略价值与市场效率的辩证统一。

其一,优化国有企业考核指标结构,将研发投入占比、核心技术专利数、产业链配套贡献、就业带动效应等长期指标的考核权重提高,降低短期营收、利润的权重。一定程度上延长管理者任期,考核结果与任期内的长期业绩挂钩。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因技术迭代、市场变化等不可抗力导致的项目失败等情形可免于问责。

其二,完善退出生态,健全资本市场退出体系:加快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为耐心资本提供份额转让渠道;完善并购重组制度,简化国有资本参与并购的审批流程,鼓励同业并购、产业链整合式退出;支持资产证券化,将耐心资本投资的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权等资产转化为标准化证券产品,提高流动性。同时,优化国有资本退出机制,明确退出的触发条件,如项目达到战略目标、市场竞争格局变化、项目持续亏损与估值标准等。

其三,提升风险容忍度,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体系:扩大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与覆盖面,对耐心资本投资的战略领域项目给予风险补偿;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参与耐心资本基金。明确风险容忍标准,设定差异化的失败容忍率,将风险容忍率纳入考核体系,允许在容忍率范围内的项目失败不影响管理者业绩。

其四,激活社会资本:强化对民营耐心资本投资的战略领域项目的政策激励,实行税收优惠、专项再贷款等,降低民营资本的融资成本。构建平等合作平台,推动设

立混合所有制耐心资本基金,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按比例出资,重大决策需双方一致同意;允许民营资本参与超额利润分成,或给予优先退出权、股权回购权等增值权益。公开耐心资本项目的投资计划、资金使用情况、收益分配方案等信息,保障民营资本的知情权,重视解决民营资本在合作中的诉求与纠纷。

五、结论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资本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人服务于资本。传统资本的逻辑是“资本支配劳动”,而耐心资本在有为政府的引导下,正在重塑资本的价值理念。其一,强调劳动的主体性,在投资项目中要求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劳动者在价值分配中的比重,避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其二,强调生态的可持续性,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投资全过程,拒绝高污染、高耗能项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其三,强调社会的包容性,关注中小企业、弱势群体的发展需求,通过普惠金融、技术支持等方式,促进机会均等。用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规范资本的行为,促进“资本向善”,让资本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而非阻碍社会公平的障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导致异化现象成为必然——人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财富积累与贫富分化形成尖锐对立,最终背离了生产要素服务于人的初衷。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耐心资本发展进路,本质是制度优势与资本属性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象化体现:党的领导提供了方向保证,避免资本与政治勾结损害公共利益;公有制主体地位奠定了制度基础,突破了资本逐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内在矛盾;共同富裕目标明确了价值导向,使耐心资本的发展不仅追求资本的长期增殖,更追求增殖收益的社会化共享。这一进路不仅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的内在局限,更构建了“资本服务于人”的新型资本与社会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本支撑,也为人类探索更合理的资本形态与发展模式贡献了中国智慧。耐心资本的发展不仅是资本形态的创新,更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配置中的具体实践,它以制度约束资本逐利的边界,以价值引领资本的社会属性,以利益共享机制实现资本增殖与人民福祉的统一,让资本从逐利工具回归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本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也为破解资本异化难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注释:

①在以下情况中,不变资本的储备可能会减少:(1)某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很大,有稳定的供应,它们的使用者不必在生产场所大量加以储备;(2)由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决定的这类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的的速度加快;(3)信用制度的发展使得这类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不必等到自己的产品售出,就可以取得它们,因而为预防出售上的偶然不利情况的储备就可以减少;(4)由于运输条件改善等原因,产业资本家的储备减少,同时商人

手中储备相应增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N].人民日报,2024-05-01.

[3]Nianzhi Guo,Anthony H.Tu.Does Culture Explain The High Private Saving Behavior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urther Evidence[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23(2).

[4]Lin Justin Yifu,Wang Yan.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Patient Capital 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Policy and Development,2017(1).

[5]Marian W.Moszoro.The Direct Employment Impact of Public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2024(60).

[6]林毅夫,王燕.新结构经济学:将“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比较优势[J].开发性金融研究,2017(1).

[7]洪银兴,姜集闯.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经济学家,2024(12).

[8]林毅夫,王燕,董熙君,等.重新审视发展融资及开发银行:耐心资本作为比较优势[J].中国金融学,2018(1).

[9]温磊,李思飞.耐心资本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4(10).

[10]陈绍辉,孙熙国.资本的二重性与耐心资本的发展进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经济学家,2025(1).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7]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J].中国经济周刊,2023(23).

[责任编辑 刘兴旺]